

中国近代史

中國近代史

第八章

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

反帝运动

——一八九五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至

一九〇一年（光緒二十七年）

第一节 緒言

如果鴉片战后，国际貿易中心从广州轉移到上海，南中国经济秩序的驟然变化，成为促起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；那末，甲午战后，北中国经济也起了驟然的变化，如开海港、造铁路、办邮电、廢漕运等等，这也成为促起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但它

們反对的对象却有差别，太平革命主要是反对滿清的封建压迫，义和团运动則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。

义和团运动是以落后的宗教迷信为形式，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羣众运动。当时人民在滿清愚民政策与宗教麻醉的欺騙影响下，只能由这种落后形式表现出他們的义憤。运动的范围在北中国特别广泛，人民狂热地参加了这个运动，比之平英团、升平社学、天津教案是有更大規模的发展。中国人民一向蘊藏着火热的、不可限量的反抗力量，历史上无数次

农民起义証明它有触必发。触发义和团运动的原因，无疑是甲午战后的外国侵略和滿清暴政。

关于外国侵略对北方人民的迫害：

（一）領土掠奪。一八九五年（光緒二十一

年），山东大刀会有排外活动，显然是甲午战后的反应。一八九六年，德国向总理衙門指明索借胶州灣。一八九七年，大刀会杀鉅野县德教士二人，德国乘机派兵强占胶州灣。清政府說「德国图占海口，蓄謀已久，此时特借鉅野教案而起」，确是实情。继德国强盜之后，沙俄占領旅順、大連，英强占威海卫、九龙，法强占广

州灣。「四十日之間，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，來日方長，何以卒歲」（康有為：《保國會演說辭》）。要挽救這樣嚴重的瓜分局面，維新派知識分子提倡保種、保國、保教的變法方案。感受威脅最大的山東人民，實行朴素的武力反抗方案。一八九八年三月底（二十四年三月初），直隸省（今河北省）大名府考試童生時城內發現很多布告：「各省愛國志士，觀西人無法無天之行為，已決於四月十五日集合，屠戮西人，焚毀其居。其不與我同心一致者，男盜女娼。聞此告示，而不為傳播者亦如之。完了。」散發布告的是大刀會，可

見它在努力宣傳武力反抗，这个办法，迅速获得北方广大民众的贊同。

（二）經濟掠奪。一八九八年，中德簽訂《膠澳租界條約》，允許德國造膠濟鐵路，並開掘鐵路兩旁三十里內各礦。山東人民曾受侵略者無數次暴戾的欺壓行為，例如膠濟路局員隨意釘路桩与高密县的农民口角互毆，德軍借口保路，枪杀农民二十余人，还勒令巡撫毓賢賠償桩价兵費三千四百余兩。又如鐵路阻碍水路不肯造桥放水，引起农民「暴动」。袁世凱明知「其（德人）恃強逞凶，动因細故称兵压胁，

久已成为惯技，而愚民仇外益甚，但仍派兵替德人镇压。山东人民激动义愤，责任全在侵略者方面。胶济铁路以外，清政府借英款，用英工程师筑成津榆铁路（一八九五年完工）、京津铁路（一八九六年完工）、京奉铁路榆锦段（一八九九年完工）。又借俄款（比国出面）筑芦（芦沟桥）汉铁路，一八九八年成芦保（保定）段，一九〇〇年成保正（正定）段。凡铁路所到地区，旧式的交通运输被棄置，路线上田地房屋坟墓被毁坏，因而招致农民的不满，加入义和团运动。

上海天津間中外輪船暢通，运河逐年失去作用。一九〇〇年起，各省漕米不論海运运河运，一律改征折色，运河竟成廢物，沿河城市衰落，元明以来南北主要水旱大交通綫从此荒棄，对两岸居民的生計是严重的打击。

洋貨进口在一八八七年（光緒十三年），中法战后，开始超过一万万两，一八九六年（二十二年），甲午战后开始超过二万万两（一九〇二年）——二十八年，庚子战后，开始超过三万万两，一九〇五年——三十一年，办假維新开始超过四万万两）。土貨出

口至一八九一年（光緒十七年）才超過一萬萬兩（一九〇二年——二十八年超過二萬萬兩，一九一一年——宣統三年超過三萬萬兩）。大抵中國戰敗一次，輸入發展一次，輸出遠追不上輸入。從甲午到庚子凡七年，平均每年入超約五千萬兩，而且輸入各貨，洋藥（鴉片）逐年減少（因土藥大量生產，售價較低），洋布棉紗及其他洋貨逐年增加。因「洋布洋紗暢銷」，使「中國之機杼機女，束手坐困者，奚啻千百萬人」（薛福成：《強鄰環伺謹陳愚計疏》）。「中國工界乃大受其影響，生計事業，几已十奪其九」（容

閱：《西學東漸記》。北方修築鐵路，更有利于洋貨的深入內地，更加速中國手工業生產的瓦解。

漢口到北京旱路及沿運河水旱兩路是中國南北交通的兩大路線。甲午以後都起大變化，再加洋貨流行，鐵路、郵電通达等原因，農民、手工業者、商人、交通運輸工人、驛站夫、鏢客等，失業破產者至少數百萬人。政府和地方官吏只顧搜括，誰也不曾顧及廣大人民的生活。

关于滿清暴政对全国人民的迫害：

（一）无情的搜括 甲午战敗，滿清政府濫借

巨額外債，除付交日本二万万五千万万两（連利息在內），余款一万二千万两用途不明，全被回扣、浪費、私吞消蝕盡淨。政府負債既多，財政愈益困難，只好盡量增加捐稅，因之甲午以后的剝削繁重，官吏貪污比以前更大進一步。一八九五年，戶部竭力籌款，有扣廉俸、增厘金、折漕米、土藥、茶葉、糖、鹽、烟、酒加稅，田房稅契設法整頓，典當各商強令捐輸等各種苛雜辦法。以山西為例，一八九六年開辦烟酒稅，每酒一斤征錢三文，每烟一斤征錢五文，綿烟十文，至一八九七年，共征銀五万余两。一九〇〇年，增稅酒五文，烟八文，綿烟十六文。

按照一般收稅通例，官吏舞弊中飽，比報解數加三倍，山西人民單就烟酒一項，一九〇〇年前每年負擔二十余萬兩，再加其他捐稅，負擔的嚴重可想見。山西如此，別省自然也毫無例外。一八九九年，戶部奏稱：「近年大費有三，曰軍餉，曰洋務，曰息債。息債歲約需兩千余萬，洋務亦約需兩千余萬，軍餉約三千余萬，此三項已七千余萬矣。此外，國用常經、京餉、旗兵餉需及內務府經費，又各直省地方經費，亦凡二千萬。收入約八千萬，短少一千數百萬兩。」全國人民飢寒交迫，政府還要加索一千數百萬兩，捐稅已經繁多，不便再添設新

名目。西太后召集大學士、軍機大臣、六部、九卿大會議，結果是議定「裁革陋規，剔除中飽，認真整頓，化私為公」十六字，這十六字的真實意義只是政府奪取各衙門已有的陋規，託官吏另立名目收規費。早在一八四三年（道光二十三年），耆英已經說出了「化私為公」的秘密，他說：「其粵（海關）例外浮費，原不難徹底查明，全行禁革，但射利之徒（官吏），營私玩法，一經查出疑目，必將視為例所應得之款，其勢必致費上加費而后已。從來清厘積弊，另定新章，大抵如此，不獨關稅一事為然。」西太后採納大臣的建議，以

「严剔中飽，力杜虛糜」名義，令各省督撫「凡取諸商民者，一併和盤托出」。北方省份，例如直隸總督裕祿交出三十七萬兩。這當然不能滿足清政府的貪欲，竟以「虽非陋規中飽，而利不在國亦不在商」為理由，提取招商局、電報局、開平礦務局、漠河金礦局「余利歸公」。當然，這還是不夠的，以「江南地大物博」為理由，特派剛毅「前往將關稅、厘金、鹽課等項實力整頓」，括得二百餘萬兩。照樣又說「廣東地大物博」，派剛毅「馳往妥籌巨款」，又括得「常年軍餉銀一百六十萬兩」。剛毅在南方共刮得一千萬兩。北

方各省比較貧瘠，雖然捐稅額不及江南，廣東那樣多，人民痛苦却並不比較少。滿清政府劫掠大量金錢，各地物價立即騰涌，就廣東物價作例，洋銀一圓不夠采三斗米，銀四錢只夠買百斤柴。但滿清政府還說是「並無絲毫加取于民」，更繼續向人民勒索。

（二）廣泛的水旱災 由于吏治的敗壞，官吏肆无忌憚的吞蝕款項，促成廣泛的水旱災。一八五五年（咸豐五年），黃河自河南銅瓦廂改道流入山東，從此經常泛濫成災。治河經費大部被官吏侵吞，堤工草率，潰決后以搶險堵塞等名義，領得額外經費飽入

私囊，水災成治河官吏的利源。一八九六年（光緒二十二年）山東巡撫李秉衡奏稱：「近來几于无岁不决，无岁不数决，除額撥經費不計外，其另案之款，十年通算不下八百万兩，而河工敗坏日甚一日。」河旁居民連年受害，与其說是天災，不如說是治河官吏制造的人禍。自一八九八年起，黃河連年大潰決，直隸的東南部，山東沿运河的西部都被決毀，災區極廣，淹死人，口十六七萬，損失田地房屋不可數計。同時北方各省連年大旱，農民吃樹皮草根甚至吃观音土以代糧食。例如災情較重的江蘇北部，穷人出賣子女，女孩按容